

專訪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

〈從扶桑到櫻花：黃英哲的學術旅程 與台灣文學的建構〉

成大中國文學系教授\蔡玫姿

訪問者：蔡玫姿（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陳葦珊（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時間：2025. 5. 24（六）

地點：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木曾路」餐廳

撰稿：陳葦珊、蔡玫姿



專訪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

行前緣起

自113年起，敝人運用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的出國經費，協助中文系「現代文學」組研究生，赴日本名古屋大學，與該校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展開學術交流。交流形式為小型論文寫作工作坊，主題訂為「跨文化交流下的生命史與敘事策略」。

第一屆於113年6月4日至8日圓滿完成，第二屆在114年5月22日至26日舉行，地點均為名古屋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相關活動除論文發表外，安排參訪該校擁有的中國留日作家郁達夫遺址，以及名古屋大學歷屆諾貝爾獎教授之紀念展室。第二屆擴大規模，清華大學楊佳嫻副教授、陳葦珊講師加入，交流層面更趨多元。也從名古屋大學拓展至愛知大學，拜

訪現任愛知大學中國研究與台灣文學學者黃英哲教授，聆聽其多年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

透過這些交流與訪談，研究生們不僅在論文寫作上獲得具體建議，更能從前輩的學術經驗中，理解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下展開對話。跨世代、跨地域的學術互動，為後進學者開拓更寬廣的思路，強化未來從事學術研究時的自信與格局。

黃英哲教授訪談錄

一、從扶桑到櫻花——黃英哲教授簡介

黃英哲教授1956年生，嘉義人，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暨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科長。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中研院台史所訪問學者、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台灣近現代史、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台灣漢學研究之翻譯。著譯作豐富且論域遼闊，舉隅如下：《扶桑書劍記》（1991）、《台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1999）、《「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2007）、《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2016）與《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2017）。

合著則有《華麗島的冒險》（2010）、《台灣理論關鍵詞》（2019）、《民主化に挑んだ台灣——台灣性・日本性・中國性の競合と共生》（2019）、《五四@100：文化・思想・歴史》（2019）、《台灣映畫表象の現在（いま）：可視と不可視のあいだ》（2011）、《台灣文化表象の現在（いま）：響きあう日本と台灣》（2011）與《尋找黑暗之光：現代知識分子的挑戰》（2024），其與台日學界均保持合作書寫不輟。

編著或譯作則超過10多種。大分兩類，一類綜整並承繼前人研究，如《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1994）、《よみがえる台灣文學：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1995）、《台灣的「大東亞戰爭」——文學・メディア・文化》（2002）。一類推動或合譯台灣小說，《台灣セクシュアル・マイノリティ文學〈1〉長篇小説——邱妙津『ある鰐の手記』》（2008）、《台灣セクシュアル・マイノリティ文學〈2〉中・短篇集——紀大偉作品集『膜』》

（2008）。同時也沒有遺漏新的研究趨勢，出版介紹華語語體系的學術書《サイノフォン 華語文學の新しい風》（2022）。

行前我特別想知道在譯介臺灣作品時，黃教授何以眼光能掃向臺灣1990年代的同志科幻小說與女同志經典作？極早呈現給日本學術圈一個性別運動風起雲湧的臺灣？雖然黃教授並不認為自己前衛，但當時譯介選文的判斷，從今日看來確實掌握時代脈動，推動臺灣獨特文學作品進入了日本文壇。

二、穿越歷史夾縫——臺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迴聲

五月的名古屋，春光正盛，百花爭妍，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涼意與浪漫的氣息。我們依約前往一間隱身於靜謐住宅區中的高級日本料理餐廳，在幽靜雅致的環境中，我們與黃教授對坐，聽他細細訴說學術與人生。

訪談開始前，黃教授從身旁拿出我們事前所寄出的訪綱，頁面上錯落著原子筆的批註與閱讀的痕跡。字裡行間的筆記，不只是對問題的準備，更像是一道引線，引領我們走入黃教授長年思索的臺灣歷史與認同課題之中。

「研究臺灣，心中不能沒有臺灣，但也不能只有臺灣。」這是黃教授對自身學術實踐的一種自覺，也是他在觀察臺灣文學與戰後現代知識份子命運時反覆浮現的關鍵句。當代臺灣文學研究與臺灣認同，長久以來便糾結於歷史創傷、政權更迭與文化越境的脈絡。自2007年《「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到2016年《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黃教授便透過兩岸知識份子——許壽裳（1883-1948）、陶晶孫（1897-1952）、張深切（1904-1965）、楊基振（1911-1990）與施叔青等知識分子的流動與定位，指出個體在歷史洪流與社會現實之間，如何調適並建構自

身的臺灣認同。這樣的認同往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政治、文化、族群乃至語言等多重因素交織下不斷變動與重構。

2024年政大出版社出版其作《尋找黑暗之光：現代知識份子的挑戰》，書中兩則重要文章：〈「盡可能的微力，作些澆花的工作」：許壽裳、楊雲萍與戰後初期台灣研究的繼承與挪用〉、〈「這個國家非垮不可」：楊基振的困境兼論台灣知識分子的「凱特曼」（Ketman）現象〉，是其過往思考的深化與延展，揭示戰後個體在宏大歷史下的游移與抉擇。

〈「盡可能的微力，作些澆花的工作」：許壽裳、楊雲萍與戰後初期台灣研究的繼承與挪用〉一文，黃教授清晰指出隨著臺灣政權的交替與時局的變化，許壽裳、楊雲萍（1906-2000）等留日的臺灣知識分子在陳儀（1883-1950）的支持下，保存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史學與農業學等研究成果。他們號召臺灣民俗專家池田敏雄（1916-1981）、昆蟲專家素木得一（1882-1970）、語言學家淺井惠倫（1894-1969）與臺灣先史學家國分直一（1882-1970）等一批日籍學者。由中、臺、日三地知識分子共同為台灣省編譯館推動一系列台灣文獻、台灣研究叢書的整理與編印，也將臺灣民俗、先史遺跡與原住民語言等方面的研究納入計畫中，進而促使「在這個過渡期中呈現了一種戰前戰後臺灣研究的人與知識生產的連續性」。儘管最後仍舊無法抵擋歷史的變動而默默收場，但這一代默默進行的實踐與交流，為臺灣研究與文化播下種子，此計畫個案可重新思考戰後初期臺灣研究的「繼承」與「挪用」。

〈「這個國家非垮不可」：楊基振的困境兼論台灣知識分子的「凱特曼」（Ketman）現象〉一文，黃教授借重楊基振的日記，揭示臺灣知識分子擺盪在中、臺、日之間的掙扎與矛盾。他指出楊基振的日記並非系統性的論述，而是頗具個人色彩且斷裂的記述，呈現不連續的書寫形態。這種狀態恰恰反映出楊基振的複雜情感，他對日本和國民黨深感厭惡，卻又同情日本友人，並且尊敬蔣介石。如此「前後不一，無法決斷的矛盾性格」，黃教授揭示這不只是楊基振個人的情緒抒發，也是臺灣人士在戰爭前後的集體處境與心態。繼而黃教授更以「凱特曼」（Ketman）現象來分析楊基振所自認的「漢民族的臺灣人與中國人」認同，並從此案例延伸，回望臺灣從日治時期到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臺，又經過了民主化與幾次政黨輪替。無論處於哪一個歷史節點，臺灣人始終在身分認同這一課題中面臨一定的考驗與選擇。

整體而言，黃教授以許壽裳、楊雲萍、楊基振等人的生命歷程為起點，為我們展現一群身處於歷史夾縫中，仍堅毅迎接挑戰的現代知識份子。他們不僅在政治權力的過渡之間，盡力為臺灣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也流露作為一個人、一群知識分子，乃至臺灣社會下的群眾對於臺灣認同的心境轉折與矛盾。

訪談中，黃教授徐徐道來過往長期對戰後知識份子處境的關注，在1949年前後曾有過一段，來自中國或臺灣的知識份子相互共處對話的時光。不論是張深切、楊基振、許壽裳等具有留日背景的臺灣文化

人，還是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臺灣文化、教育與史學等領域合作無間締造一部份成果。雖然背景各異，卻不約而同地在動盪時代中為臺灣文化的延續與建構盡一分心力。在黃教授口中，那是一個兩岸知識分子共同「尋找黑暗之光」的時代，縱然過程中歷經種種挑戰，卻蘊含無限的可能性。

同時，黃教授也指出幾位相對被忽略，卻在歷史過渡時期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例如：臺灣史學家黃得時（1909-1999）、語言學家吳守禮（1909-2005）與臺灣作家洪炎秋（Ketman）。他們都曾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在臺灣文學史、臺灣方言與大學教育等領域貢獻卓著。只是在政權更替與學術潮流的轉變過程中，他們逐漸被邊緣化，以至於至今未受到應有的關注與肯定。因而黃教授提醒我們，除了目前的主流論述之外，如果未來能藉著這些沉默而堅定的有志之士，以及他們所留下來的知識成就與學術理念，尋覓並重返其著述，為臺灣研究開展一番新意。

三、走在時代前端——「台灣文學」在日本

訪談進行至此，從幾位「戰後現代知識分子」，延伸談及「台灣的文學」在日本如何成為「台灣文學」一專業學門時，黃教授的眼神無不流露著興奮，向我們述說這不單單是一個專有名詞的形成過程，更是關乎台灣文學如何在日本被建構，再到重新界定的歷史演變。

早在世紀末，黃教授便觀察到台灣文學研究、台灣

文學在日本的發展脈動，並且積極投入台日學術與文化之間的交流。他先後主編《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1994）與《華麗島的冒險》（2010）兩部譯本，前者偏重翻譯日本學界對於臺灣文學的十篇重要研究，後者則偏重將日本作家的臺灣書寫譯介至華文世界，為台日之間的學術對話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在學術界引起話題，台灣文學在日本的接受與脈絡逐漸受到關注與重視。接續此熱潮，2021年黃教授發表於《文訊》的〈「典範轉移」台灣文學在日本〉以「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為主標題，開宗明義表明「台灣的文學」轉向「台灣文學」的歷程，隱含著日本學界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紀，對於「何謂台灣文學」此一核心問題的態度轉變與共識。

黃教授認為「台灣文學典範在日本的建立，是幾代的眾人之功，而非少數之功」。1980年代日本學界因著台灣的鄉土論戰，從1984年到1985年短短兩年間共出版三本台灣現代小說選，翻譯了李喬、陳映真（1937-2016）、洪醒夫（1949-1982）、宋澤萊等人的作品。這當中松永正義教授在〈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裡舉出台灣本身複雜的歷史背景，使得台灣的文學難以區別於中國文學。到了1990年代，以山口守教授為首的日本學者意識到在政治分立的情形下，當代台灣已經表現明確的台灣意識與精神，進而台灣文學便不再作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台灣的文學」就此轉變為「台灣文學」。隨後黃教授指出千禧年葉石濤（1925-2008）《台灣文學史綱》在日本的出版，與台灣文化「混合性」的歷史



語境，一同確立「台灣文學」在當代日本的定位與典範。

台灣文學之所以能逐漸成為日本學界重點關注的對象，除了台灣文學的長期推動之外，更伴隨著大量台灣文學作品的譯介與出版，明顯擴大了台灣文學在日本的能見度與討論度。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黃教授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他與橫濱國立大學白水紀子教授、橫濱大學垂水千惠教授等一批日本學者合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性少數文學」選集——《台灣セクシュアル・マイノリティ文學》系列。總共四冊，其中重點選譯邱妙津（1969-1995）《鱷魚手記》、紀大偉《膜》以及多篇代表性的性少數文學。這一系列於2008至2009年間在日本陸續出版，被視為將台灣性別與酷兒文學引進日本市場的重要先聲，不僅走在時代的前端，也為後續相關性別研究與閱讀風潮建立了穩固的根基。

對此，黃教授坦言，這一出版計畫的起點，一方面來自於黃教授對台灣鄉土與文化的熱愛，另一方面則表明「我們需要受眾，起碼要掌握日本學者與讀者感興趣的方向。」這層現實考量主要是考慮到當時日本社會整體對於性少數、同性戀或性別議題的接受度相對保守，大大影響著台灣性少數文學在日本的發展時機與能見度。正因如此，黃教授與翻譯團隊在選擇作品時尤其謹慎，也依靠長久對於日本社會的觀察與直覺，最終決定將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紀大偉的《膜》等作品納入「台灣性少數文學」出版系列。這些作品皆為當代台灣性別文學的一時之選，既能夠很好地引起日本學術界與讀者的興趣與好奇，也讓台灣文學以不同樣貌進入日本群眾的閱讀視野。

然而，如此的選擇也並非毫無代價。黃教授直言，「走在時代前端需要勇氣，就當時的書籍銷量，賣得不是很好。」這一系列性少數文學的翻譯雖然具有開創性與前瞻性，但在當時的市場反應並不熱烈。對於此現象，黃教授表示學術與文化的價值，往往不在當下立即的回應，而是在多年以後，這一

系列譯作不但成為今日日本研究邱妙津、紀大偉與台灣酷兒文學的重要依據，更被視為台灣性少數文學在日本發展的關鍵里程碑。

四、結語

這十多年來，黃教授將研究視野放諸於30年代至50年代之間的文化史脈絡，細緻梳理戰後初期台灣與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斷裂動盪中的思想與行動軌跡。近年來，除了延伸至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海外台灣人所興起的「返鄉熱」，深刻討論現代知識分子的離散、漂泊與文化越境的複雜經驗。黃教授的關注更朝向華文文學世界，在訪談過程中他特別透露從最開始的台、日文學翻譯，翻譯目標在近期逐漸轉往馬華文學一領域，並且已展開譯介工作。

訪談的最後，我們問起作為學者、編者，亦是翻譯者的他，之後有可能進行什麼主題的研究？或是如封德屏先生在《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中〈另一種婉約風情〉所想像的那般，出版一本屬於自己的小說集？黃教授笑說：「暫時沒有這個想法，還是想先到處遊山玩水。」這當中語氣看似輕鬆，但話語背後交織著歷經長年學術奔波後，想讓自身放慢腳步的願望。

午後雨聲淅瀝，離開名古屋那間靜謐的日式料理店時，黃教授的話語依舊縈繞耳際。他關心的不僅僅是一代歷史的脈動與台灣文學的發展，更是一群現代知識分子在歷史縫隙中所留下的微光。這種對時代下的個體與台灣文學的深切理解，或許正是黃教授多年筆耕不輟、穿越於中、台、日之間的動力來源。在這場珍貴訪談的尾聲，我們也彷彿從黃教授的話語與姿態中，捕捉到一種身為當代知識分子的研究堅持與韌性。一路走來，肩負著台灣研究在日本發展的重任，只為了能夠記錄那些尚未被發現的聲音，以及保存那些悄悄被時間掩埋的歷史記憶。那一席話，如春日微風般溫柔而深刻，至今仍留存於心，餘韻不絕。